

惲敬集

上



014011224

I214.92

11

V1

惲

敬



〔清〕惲敬著
 萬陸謝冊冊
 林振岳集評
 林振岳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14.92 上

11
V1



北航

C169831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惲敬集/(清)惲敬著;萬陸,謝珊珊,林振岳標校;林振岳集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053-9

I. ①惲… II. ①惲… ②萬… ③謝… ④林…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29610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惲敬集

(全二冊)

[清]惲敬 著

萬陸 謝珊珊 林振岳 標校

林振岳 集評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4.375 插頁 12 字數 502,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7053-9

I·2757 平裝定價:80.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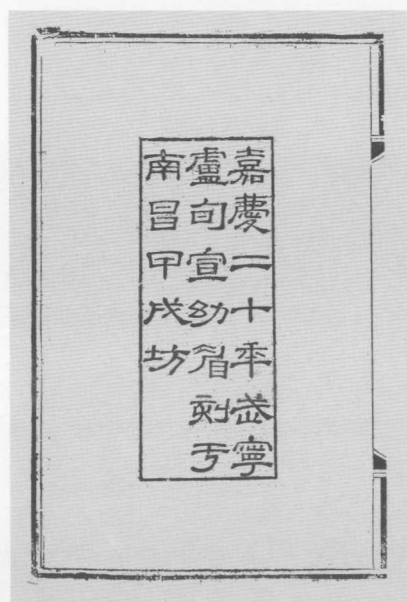
大雲山房文彙通例

一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故漢魏以來多自書子集中
皆書字用王子淵法也序記文多自書余宋人稱人
曰賢自稱曰愚亦入之序記集中皆書名碑志文漢
魏本文不入撰人名集中入撰人皆書名用韓退之
法也傳文後書論曰用班孟堅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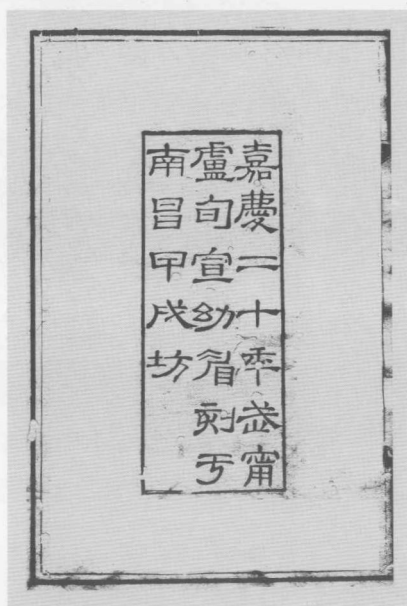
一大傳本史書體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不入本集後
人有入本集者或自存史彙或爲史官擬彙而已集
中無大傳其小傳外傳傳中必書名祖父及傳中所
及之人雖貴且賢必書名祖父賢始見子孫亦然妻

原命

無形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形知無形無氣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氣知無氣夫氣不有嘔然而和者乎穆然而肅者乎其嘔然者非秩然而序無以大其穆然者非攸然而通無以久其序而大通而久者不有其敦然者乎是故仁也義也禮智與信也五者與氣俱者也雖然氣行矣氣之過無以生氣之不及無以生其生形者皆氣之中也人之生形也得中之中得中故無過而仁無柔義無躁禮無飾智無詭信無固也得中故無不及而仁無忍義無憊禮無嗇智無蒙信無岐也是故



嘉慶二十年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牌記



同治二年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牌記

吳如葉調生廷珪雷甘亭陵元和馮林一桂岑
 長洲潘麟生鍾瑞德清俞蔭甫懋而授五
 有得朱曰異因遂錄此序先生文集
 原刻外有續存本存身存余此存為
 川刻完顏文初云宋宋有序後誤存
 誤誤存少後得誤云勘字尤臻美
 備渴然生平庶益不遜云華陽後序
 王秉恩跋



前言

惲敬，生於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初一（公元一七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一八一七年十月三日），字子居，陽湖人（今江蘇常州武進）。

惲敬在文學上主要以散文著稱，尤其是他的散文理論，系統精到，稱一代之雄，被尊為陽湖派的創始者與代表作家。

自陽湖派崛起於文壇，迄今已逾兩百年。其間，一般人都目之為桐城派的支派，不少文學史家與文論家甚至將它與桐城派視為一體。他們在論證自己的主張時，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引用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中的這段話：「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於方望溪。」但這裏說明的只是桐城三祖之間的師承關係，他們與惲、張自己是否存在裔傳則并未明說。相反，若從該文的上下段落看來，惲敬對方、劉、姚的批評之意倒是十分清楚的。如這句的上段，在估評了唐宋以來的古文大家後說：「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疏。」談及風靡全國的桐城文派時，他則說：「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他甚至以自己未沾染「桐城文氣」為幸：「所幸少

樂疏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所以，如果僅據片言只語即斷定惲敬取法於方、劉、姚，進而論定陽湖派爲桐城派之支派，似還可再作討論。

當然，歷史本身具有繼承性，尤其是文學藝術的繼承性更其明顯。毛澤東同志說：「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如此，文化藝術更其如此；不同思想體系的新舊文化如此，同一時期的文學流派更是如此。而作爲我國文學史上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的桐城派，更不可能對同代的散文家不產生影響。加之自雍正十一年，方苞替和碩果親王編《古文約選》，爲全國各地諸生提供了「助流政教之本志」的示範書，乾隆初又「詔頒各學官」，成了欽定教材，其「義法」更具毋庸置疑的權威性，終至形成了「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的一統局面，甚至說：「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這樣，追隨者有之，附庸者有之，拉大旗作虎皮者亦有之。陽湖派究竟屬於何種情況，自然就應作具體分析了。陽湖派另一個代表人物張惠言說：「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於其師劉海峰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矩。」（《茗柯文編·文稿自序》）以後，陽湖派的後繼人物陸繼輅在《七家文鈔序》中也說：「乾隆間，錢伯坰魯思受業於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

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致古文……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由此看來，惲、張諸公接受過方、劉、姚的影響是肯定的。但若要稱同一流派，就不應僅有一般的影響，而應以共同的或者基本一致的政治傾向、藝術觀點、美學理想為前提。而這一切又只有從其產生的歷史條件、主要文學主張及創作傾向等方面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一

陽湖派以地域名，這無疑是受桐城派影響的結果。但惲敬、張惠言、吳德旋等人當初并未以「陽湖派」自命，更無與桐城派角逐的意思。他們被稱為派，是吳德旋以後的事，而且也還只見於朋友的談笑間。《清史稿》說：「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并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抗。然繼輅選七家古文（陸繼輅編選的《七家文鈔》選人者除惲敬、張惠言外，還有劉大櫟、姚鼐、方苞、朱仕琇、彭績——引者注），以為惠言、敬受文法于錢伯坻，伯坻親業劉大櫟之門，蓋其淵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窺《史》、《漢》，桐城、陽湖皆未嘗自標異也。」（《列傳二百七十三·文苑三》）直到光緒元年，繆荃孫遵張之洞之囑編《書目答問》時，才在集部正式立桐城、陽湖兩派。這說明陽湖派出現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正式立名，則應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

馬克思曾經說過：「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現存的衝突中去加以解釋。」（《政治經濟學批判》）爲了探求陽湖派出現的客觀歷史條件，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十九世紀初在我國的物質生活中出現了什麼樣的矛盾，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

十九世紀初葉，正值清王朝由興盛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逐步轉向衰亡的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的過渡階段。這種過渡，實際上從乾隆後期，亦即姚鼐的晚年便開始了。它是由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促成的。這時，國際上，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以空前的速度飛躍發展，西方近代科學和與之相應的民主思想像所有處於新生階段的事物一樣，顯示着無限旺盛的生命力。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影響下，我國從明中葉後即已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便更迅速地增長。特別是人文萃集的江浙一帶，由於和外國經濟、文化交往頻繁，其發展速度更快。如在蘇、杭一帶，清初曾以「抑兼并」爲名，規定每一絲織機戶的織機不得超過百張，康熙時便有所突破，並不得不宣布廢除前令。於是「富有機戶」便「暢所欲爲」，至道光時「遂有開五六百張機者」（汪士鐸《江寧府志》）。蘇州還出現了雇傭工人，他們與機戶商定，「至於工價，計工受值，視貨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爲增減」（江蘇省博物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還有的「賬房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居處，雇匠織造」（《吳縣志·物產二》）。這說明新興的生產力和生

產關係正在腐朽的封建機體內萌發、生長。清王朝爲了鞏固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便頑固推行「強本抑末」和「閉關自守」的政策，雍正帝認爲「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諭令臣下「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爲貴」（《清世宗實錄》卷五七）。這樣，便使資本主義萌芽因素與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表面化。作爲這種矛盾的表現，其一是政治上招致了國內各族人民的武力反抗，從川、陝、雲、貴等邊疆到湘、楚等內地，由苗、瑤等少數民族到漢以至滿族內部，諸如白蓮教等反抗組織紛紛出現；其二是思想意識形態內，「泰西」文化的影響在擴大，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進步思想家和文學家亦以自己的著述和作品傳達了時代的召喚與抗爭。

在進步的思想家中，比較突出的是比憚敬年長卅三歲、與憚敬的故鄉陽湖相距不遠的安徽休寧人戴震。他四十歲中舉，五十一歲任《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不但精通文學、音韻、訓詁、考證，而且對天文、地理、曆算的研究也很精到，是負有盛名的學者、漢學皖派的奠基人。他在那種視諸子百家爲「異端詖說」，獨尊宋儒理學，文字獄猖獗的氛圍桎梏下，敢於向被列爲「十哲之次」的朱熹挑戰，認爲世界的本原不是道，也不是理，而是氣，是陰陽五行。他說：「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原善》）「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孟子字義疏證》）「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同上）這就不但指出了道、理的來源均爲物質，而且肯定了物質永遠在運動、發展、變化的總規律。他還說：「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嗅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

也。」「耳、目、口、鼻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均見《原善》戴震的一再強調道、理、性的客觀性，說明它們是可以通過人的各種感官認識的物質，這對當時把理、道、性抽象為至高無上、不可知的聖道的「道統」與「治統」合一的理論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對當時直接秉承最高統治者的鼻息，因而受到當局寵愛的吳派漢學提倡的埋頭考證、墨守師說，崇古復古的主張，戴震更是針鋒相對，提出「聞道」說加以角牴：「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答鄭丈用牧書》）他的「聞道」說，對於把生員士子從故紙堆中引到關心現實生活上來確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這裏，他的「道」不但與方苞、姚鼐的直接代之以程、朱「義理」不同，而且和他們讓「考證」直接為「義理」服務的主張更有本質之別。他雖然說：「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與方希原書》）但他又認為：「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返而求之六經。」（《原善》）却不能不說是切中桐城派之時弊的。

恩格斯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自然辯證法》）如果說，桐城派是適應了為建立鞏固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需要，產生於清王朝的興盛時期，而當時統治者的意願與社會發展的進程是合拍的，因而出現之初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那麼，當清朝政府面臨由盛到衰的過渡，面臨內外矛盾日益加劇、中

國歷史的轉折點——鴉片戰爭即將到來的新局面，還一味死抱「義法」說不放，就難免要成為新思想的桎梏了，關於這點甚至桐城諸公自己也深切感到了捉襟見肘之苦。如被稱為「曾門四大弟子」、曾代表桐城派主全國文壇、編《續古文辭類纂》的黎庶昌就曾哀歎：「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尚。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乃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道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又說：「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逾百歲，其弊至於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續古文辭類纂序》）這說明連他們自己也看到了桐城派如不革新主張以適應新的形勢，勢必重蹈他們的先輩唐宋派文人的覆轍。進行這種革新嘗試的其實應首推惲敬、張惠言等一批生活在資本主義萌芽因素較為發達的陽湖地區的文人，這就是陽湖派。

二

陽湖派的創始人是惲敬。他出身於下層正統知識分子家庭。其父「自祖考皆不仕，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為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張惠言

《茗柯文編·封文林郎惲君墓志銘》。惲敬自己，三歲學小學，十一歲學詩文，十五歲學六朝文、漢魏辭賦，十七歲學唐、宋諸大家文。他在成年之後，隨舅父鄭環外出，尤其是廿六歲中舉，廿八歲進京科考，後任咸安宮官學教習，在與同鄉莊述祖、莊獻可、張皋文、桐城王悔生的交往中，開始接觸桐城古文，并「漸有以知其非」。據張皋文稱，在京時他們「議論文章，磨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八年之間，共躋於舉場，更歷困苦，出頰仰塵俗，人則相對以悲……」（《茗柯文編·送惲子居序》）惲敬自己也說：「敬生於下里，以祿養趨走天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上曹儷笙侍郎書》）此後，他雖曾出仕多年，但始終只能充任地方小吏，知浙江之江山，山東之平陽，江西之新喻，瑞金等縣。他嚴於職守，持法以正，所以每知一縣，均得士民好評。關於他的政績，《清史稿》曾這樣述評：「選令富陽，銳欲圖治，不隨羣輩俯仰。大吏怒其強項，務裁抑之，令督解黔餉。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後遭父喪，服闋，選新喻。吏民素橫暴，繩以法，人疑其過猛。已乃進秀異士與論文藝，俗習大變。調知瑞金，有富民進千金求脫罪，峻拒之。關說者以萬金相啗，敬曰：『節士苞苴不逮門，吾豈有遺行耶！』卒論如法。由是廉聲大著。」（《列傳二百七十二·文苑二》）他持節如此，當然得不到當政者的歡心，也容易受陰謀家的暗算。也就在吳城就任時，「坐奸民誣訴隸詐財失察被劾。忌者聞而責曰：『惲子居大賢，乃以賊敗耶！』」（同上）不過，這些經歷使他能與下層士民有較多的接觸，而這正

是他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寫出一批「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陸繼輅《七家文鈔序》）的散文的重要基礎，也是他的思想藝術之花植根的土壤。

惲敬利用從政的間隙，還「究心於黃宗義《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所以吳德旋認為，惲敬「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同上）。這說明，惲敬不像方、劉、姚那樣，言理，離不開孔、孟、程、朱、濂、洛、關、閩；言文，則局限於韓、柳、歐、蘇。加之他的家鄉資本主義萌芽出現較早，發展較快，受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影響較大，他上能取我國古代諸子百家之長，下又體恤民情，洞悉民意，還能兼習「泰西文化」，這也是他能提出在當時堪稱有見地的文學主張，以救桐城之弊的重要原因。因此，他的思想就必然要比居高位、囿成見的桐城大家高明得多。

桐城古文在思想內容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十分強調以唐宋八家之文去載程朱理學之道，因此他們都把程、朱奉若神明，將他們的思想看成顛撲不破的聖道。方苞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王兆符《望溪文集序》）相標榜，「非闡道益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方宗城《桐城文集序》），甚至說：「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李剛主書》）劉大櫟論文時，直接論及程朱處雖然不多，更多的是談「義法」之「法」，但他的「法」是完全

爲表現程朱之「義」服務的，他把「義理」稱爲「行文之實」、「作文之本」（《論文偶記》）。姚鼐則比方，劉又更前進了一步，他既明確提出「明道義、維風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復汪進士輝祖書》），又具體闡發了將「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的主張，以「考據」充實「義理」之內容，以「辭章」完善「義理」之表達，說來說去，還是把宣揚孔孟之「道」、程朱之「義」放在第一位。

惲敬與他們不同，由於時代、階級，也由於世界觀的局限，他雖不能如黃宗羲那樣提出「無氣則無理」——沒有物質則沒有精神的唯物論命題（《明儒學案·河東學案》），也不能如顧炎武那樣一針見血地揭穿理學的實質——「所謂理學，禪學也」（《與施愚山書》），或者像戴震那樣徹底戕伐理學的危殆——「酷吏以法殺人」，理學家「以理殺人」（《與某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理》）但至少他是堅持對程、朱持批判態度的。在《姚江學案書後一》中，他認爲即使程朱義理當時可立，也會時過境遷，應「合前後之說相較」，「若夫守陳腐之言，循迂僻之行，耳不聞先儒千百年之統緒，目不見士大夫四海之淵源，而曰『吾主朱子』，『吾主敬齋』，『吾主敬軒』，欲與爲先生之說者力抗，至則靡耳」。何況「朱子、敬齋、敬軒揆之聖賢，又有過不及哉」？他甚至把王陽明的「致良知」說譏爲「權救饑」的「道人講義」，認爲「黑固不可以爲白也，夜固不可以爲晝也」，關鍵還在自己要「善觀之而已」。在《姚江學案書後二》中，他雖表示不同意有人完全把「陽明之